

论东吴的“西土之援”

徐超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48)

摘要: 东汉末年复杂多变的形势使得东吴略取益州的战略未能顺利实行,为了减轻上游威胁、抗衡曹魏势力,东吴转而积极谋求“西土之援”。其经营的“西土之援”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土西部的防御安全,造成了“合东西之势进图北方”的有利态势。然而因为敌我关系的多变,“西土之援”并不稳固,存在着“合东西之势”作用的有限性和“籍外交而不能固”的问题。

关键词: 东吴; 益州; “西土之援”; 军事地理; 李焘

中图分类号: K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491(2015)01-0059-05

李焘《六朝通鉴博议》认为“孙权之初”“不得淮则无以拒北寇之入,不得荆则无以固上流之势,不得益则无以为西土之援”(卷1)^[1:156],这一论断鲜明的指出淮南、荆州、益州三地对于立国江左的割据政权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目前学界有关三国时期淮南、荆州军事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颇多^[4:187-250],但对于益州的“西土之援”问题的探讨则相对较少。本文以李焘提出的“西土之援”为思维出发点,试图分析三国时期东吴的“西土之援”问题,以期获得别样收获^①。

“西土之援”是李焘立足于东吴本身情况对益州地区的一个战略定位。笔者以为,对此概念的理解可以参考《隆中对》中的相关描述。诸葛亮在为刘备分析天下形势时指出“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卷35)^[2:912],这里的提到的“援”和“西土之援”的“援”,只是在战略方向的表述上调换了一个位置,一个从东向西,一个自西而东。因此,此“援”可以引申为地区形势上的援助、支援。但结合三国时期的历史情况,笔者发现“西土之援”问题并非表面上的简单理解,这其中还存在一个不断变化的态势,即东吴从谋取益州地区到谋求、经营“西土之

援”的变化。因而,在探讨“西土之援”问题之前,必须先要分析一下东吴对益州的相关图谋。

1 孙权集团对益州的积极谋取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卷35)^[2:912-913],诸葛亮的这句话高度概括了益州地区的战略优势,这个优势不仅仅适应于刘备,同样也有利于孙权。更为重要的是,保有益州是孙权集团立国江左的重要保障。益州地区,易守难攻,处于长江的上游,在兵要地理上居于形胜之地,正如后人所言“夫江南所恃以为固者,长江也,而四川据长江上游,下临吴、楚,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卷52)^[3:2502]蜀国使臣邓芝在赴吴求好之时就直面孙权“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对于依靠“三江之阻”的东吴来说,不能有效的解决“上游之势”就无法凭险立国(卷45)^[2:1071-1072]。后来的历史发展有力的证明顺流而下的巨大威胁。西晋灭吴时,王濬水军就是从益州顺流而下直捣建业迫使吴主孙皓投降。李焘虽然感叹“不得荆则无以固上流之势”,但“不得益”同样“无以固上流之势”。益州对江左地区在兵要地理上的制约影响,使得孙权集团必须要积极的谋划、经营益州地区。

不过,对于益州,孙权集团起初的谋划是“图

收稿日期: 2014-06-26

作者简介: 徐超(1990-),男,安徽芜湖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从事战国秦汉史、历史军事地理研究。

①为行文方便,本文的东吴、蜀采用广义的概念,并不严格限定在双方称帝建国之后。下文出现的“孙权集团”、“刘备势力”则是进一步的准确描述。

”而非“援”。《三国志》卷55《吴书·甘宁传》记载甘宁向孙权陈计：“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卷55）^[2:1293]甘宁明确建议要西行夺取巴蜀地区。而东吴谋臣鲁肃在为孙权谋划天下大势之时，也指出了夺取益州地区的重要性。《三国志》卷54《吴书·鲁肃传》如是记载：“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卷54）^[2:1268]这里的“竟长江所极”“高帝之业”指的就是益州。在鲁肃给孙权的战略计划中，夺取益州是图天下的关键。但是，无论是甘宁的“渐规巴蜀”还是鲁肃的“竟长江所极”都是停留在战略规划中，当时的孙权集团还没有相应的实力与机遇实施谋夺益州的战略。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孙权集团的益州战略亦尝试具体实施。《三国志》当中就保留了两段关于东吴试图夺取益州的史料：

（1）《三国志》卷54《吴书·周瑜传》载“是时刘璋为益州牧，外有张鲁寇侵，瑜乃诣京见权曰：‘今曹操新折衄，方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方可图也。’权许之。瑜还江陵，为行装，而道于巴丘病卒。”（卷54）^[2:1264]

（2）《三国志》卷54《吴书·鲁肃传》注引《江表传》载“初瑜疾困，与权笺曰‘瑜以凡才……自效戎行。规定巴蜀，次取襄阳，凭赖威灵，谓若在握……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傥或可采，瑜死不朽矣。’”（卷54）^[2:1271]

相对于甘、鲁二人的建议，周瑜对于益州的谋划开始付诸于具体行动。由于赤壁之战的胜利，曹操集团“新折衄”且“方忧在腹心”，孙权集团获得了对外发展的良机，开始把握“刘璋暗弱”“张鲁寇侵”的机遇，进攻巴蜀。但是因为刘备集团占据了荆州地区，使得孙权必须要考虑刘备对于其攻略益州的态度。相关史料笔者收集如下：

（1）《三国志》卷54《吴书·鲁肃传》载“先是，益州牧刘璋纲维颓弛，周瑜、甘宁并劝权取蜀，权以咨备，备内欲自规，仍伪报曰‘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原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於山林。’”（卷54）^[2:1271-1272]

（2）《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载“权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为宜报听许，吴终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为己有。荆州主簿殷观进曰‘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赞其伐蜀，而自说新据诸郡，未可兴动，吴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如此进退之计，可以收吴、蜀之利。’先主从之，权果辍计。”（卷32）^[2:879-880]

（3）《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载“孙权欲与备共取蜀，遣使报备曰‘米贼张鲁居王巴、汉，为曹操耳目，规图益州。刘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则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进讨张鲁，首尾相连，一统吴、楚，虽有十操，无所忧也。’备欲自图蜀，拒答不听……权不听，遣孙瑜率水军往夏口。备不听军过，谓瑜曰‘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于天下也。’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权知备意，因召瑜还。”（卷32）^[2:880]

李焘曾感叹荆襄地区为“天下之脊，东援吴，西控蜀，连东西之势，以全天下形胜”。（卷1）^[1:162]从军事地理方面来看，刘备占据的荆州地区堵住了孙权集团西略蜀的道路，“吴终不能越荆有蜀”。据上述史料可知，（刘）备欲自图蜀，拒绝了孙权集团对于益州的一系列请求，甚至在双方联盟的情况下，分兵拒收，“不听军过”。由于曹操、刘备、孙权三方的实力对比和北方持续的军事压力，孙权不能与刘备全面开战，只能坐视着刘备最终占据益州，同时也意味着自身图占益州战略的破产。

2 东吴谋求与经营“西土之援”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集团抢先占得益州，初步完成了“跨有荆益”的战略态势，孙权集团“竟长江所极”的计划也随之落空。更为严重的是，相对于“刘璋暗弱”，“有兼并心，且居国上流”的刘备集团对立国江左的东吴形成了严重威胁（卷54）^[2:1272]。“孙权知东南形胜必在上流”^[3:3484]，因而积极谋夺荆州，实现“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卷54）^[2:1278]。《三国志》卷32《蜀书·先主传》载：“（建安）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是岁，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权连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引军还江州。”（卷32）^[2:883]在夺得荆州部分地区之后，孙权集团又

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利用关羽北伐、后方空虚的机会,派兵袭杀关羽全据荆州。再经过后来的夷陵之战,东吴最终占稳了荆州之地,巩固了上流之势。

然而,占据荆州并没有彻底解决顺流而下的威胁,反而因为吴蜀交恶,问题更加严重。夷陵大胜后,孙权在拒绝群臣“劝尊号”接受曹魏册封时,就提到了“便当与西俱至,二处受敌,於孤为剧”的担忧(卷47)^[2:1130]。吴、蜀从实力上远不及曹魏,与蜀结怨后,东吴陷入了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战略形势的恶化使得孙权不能安稳的称王称帝。夷陵之战使蜀汉暂时无力东出三峡,但曹魏军队却趁吴蜀两败俱伤之机施压东吴,频频派兵征讨(卷47)^[2:1125-1126]。此种局面下,孙权主动遣使入蜀,谋求“西土之援”(卷47)^[2:1125]。朱绍侯先生认为“在猇亭战役之后,孙刘之间很快就恢复了友好关系”“很可能是刘备首先伸出友谊之手,孙权很快就作出了积极的反映”^[9:21],笔者以为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孙权的话语极有可能是托词,还是其主动遣使入蜀来解决当前的不利局面。

另一方面,夷陵之战也使蜀汉重新回归到“东合孙权”的战略当中,对东吴展开了积极的外交往来,“两国之使,冠盖相望,不绝于道”(卷1)^[1:156]。在双方的外交往来中值得重点提及的就是蜀使邓芝的访吴。(黄武二年)冬十一月,蜀使中郎将邓芝来聘。”(卷47)^[2:1130]面对“邓芝来聘”,孙权先是“狐疑,不时见芝”,在邓芝自表“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之后,孙权直接提到“孤诚原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偏,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邓芝答复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卷45)^[2:1071-1072]笔者以为邓芝的回复可做两点分析:其一,直接点明了吴蜀联盟的根本目的,“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其二,带有威胁性的预判孙权集团选择的困境,若不联蜀,“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东吴如果不谋求“西土之援”,那么面临的的就是曹魏的“奉辞伐叛”和刘蜀的趁火打劫。所以孙权在“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之后,于第二年“遣辅义中郎将张温聘于蜀”。(卷

47)^[2:1130]蜀国对张温的来访,“复令芝重往”(卷45)^[2:1072]。《三国志》卷47《吴主传》注引吴录载:“是岁蜀主又遣邓芝来聘,重结盟好。权谓芝曰:‘山民作乱,江边守兵多阙,虑曹丕乘空弄态,而反求和。议者以为内有不暇,幸来求和,於我有利,宜当与通,以自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边外,间隙万端,而长江巨海,皆当防守。丕观衅而动,惟不见便,宁得忘此,复有他图。’”(卷47)^[2:1130-1131]此次,孙权直接向邓芝说明内有“山民作乱”外有“曹丕乘空弄态”,且“土地向外”主要是为了对付曹魏。如此表面内部虚实,可见孙权对于经营“西土之援”的重视程度。

除了邓芝使吴之外,陈震求盟也需要重点关注。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诸葛亮派卫尉陈震至东吴表示祝贺,并且“孙权与震升坛歃盟,交分天下”(卷39)^[2:985]。孙权曾因担忧蜀军东下、两面受敌而不敢称帝,此时敢于称帝某种程度上有赖于“西土之援”。在尝到“西土之援”的甜头后,借机与蜀汉正式订立盟约,建立“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的攻守同盟(卷47)^[2:1135]。自此以后,吴蜀间“聘使往来以为常”(卷47)^[2:1131],吴国的郑泉、是仪、张温,蜀国的宗预、董允、邓芝等人经常作为使者来往于两国之间。孙权对于接待蜀国来使给予了很高的待遇,即使是孙权死后,吴国内政逐渐败坏,维持吴蜀关系,保有“西土之援”也是东吴的常备之策。比如,吴孙亮继位时,诸葛恪为伐魏派李衡使蜀,约姜维一同起兵(卷64)^[2:1435];吴主孙休时,王蕃使蜀“蜀人称焉”(卷65)^[2:1453]。

东吴经营“西土之援”是在“先主、武侯奄蜀汉,而益未属吴”的局势下(卷1)^[1:156],迫于魏蜀吴三方的实力对比而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一种被动形势下的积极反应。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本文讨论的东吴“西土之援”与传统的吴蜀同盟还存在明显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其一,从时间上,东吴经营“西土之援”是在夷陵之战后全据荆州的形势下,针对益州地区的战略考虑。换言之,夷陵之战前的孙刘关系并不是本文“西土之援”问题的讨论范畴。其二,从空间上,东吴谋求“西土之援”形式上表现为出使求盟外交往来,本质上却只是针对益州地区兵要地理上的考量。

3 “西土之援”的积极作用与不足之处

“孙权以一隅之半,则其势力必不加于魏,而君

臣相谋,连荆、益之险,合东西之势,以扛北方,最策之得也”(卷1)^[1:156]李焘在《六朝通鉴博议》中高度评价了东吴立国高明的战略决策。谋求与经营“西土之援”作为其战略决策中的重要一环,其产生的积极作用及存在的不足之处需要仔细分析。

3.1 “西土之援”的战略积极作用

(1) 一定程度巩固了“上流之势”,部分消除了顺利而下的威胁,保证了东吴西部的国土防御安全。

“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邓芝之语点明了东吴西部的战略威胁。而东吴谋求与经营“西土之援”,使吴蜀双方在联盟抗魏的大旗下基本能保证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的局面,从而减轻了东吴侧翼的战略威胁,使其可以全力备魏。

(2) 经营“西土之援”使得吴蜀两方东西合纵、左右犄角,可以有效集中主要军力对抗北方曹魏势力,守土进取,即“合东西之势,进图北方耳”。

“吴为天下之首,蜀为天下之尾,而荆楚为天下之中;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卷3)^[1:186]荆州、益州和东吴三个地方在南北军事对峙中形成了相互支援、相互配合的战略态势。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为刘备做出了“跨有荆益”“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秦川”的战略谋划,简而言之,便是以荆、益为根据点,两路出兵,形成对中原地区的钳形攻势,以图霸业。东吴经营“西土之援”的战略考虑也是立足于荆、益二州甚至是荆、益、吴三地的战略攻势,相对诸葛亮的谋划,东吴的战略考虑是将一方的分击变成了两方的配合。这也就是李焘所强调的“合东西之势”。吴蜀弱而曹魏独强,是整个三国时期最大的历史背景。东吴经营“西土之援”就是最大限度的利用吴蜀两国军事地理方面的优势,东西联合,左右犄角,以图北方,所谓“东西有事,二方皆急,诸将意沮”(卷4)^[2:125]。可以说,东吴经营“西土之援”使得吴蜀双方在军事上形成了有效的战略配合,“吴攻其东,汉入其西,彼救西则东虚,重东则西轻”(卷64)^[2:1435]左右犄角,给曹魏政权造成了极大困扰,吴蜀“进图中原而有余”(卷1)^[1:156]李焘在《吴论》中提到“诸葛亮祁山之役,三郡回应,关中震动,明帝西镇长安,而陆逊因之走曹休于石亭,贾逵力争疾救,仅得曹休之归”(卷1)^[1:156]正是吴蜀联合进图北方的代表性行动。除此之外,双方“合东西之势”的联合行动还有许多,

比如诸葛恪进攻合肥派遣李衡西入益州求姜维策应。而“犄角”一词更是屡现于双方庙堂之上,如“吴王孙权同恤灾患,潜军合谋,犄角其后”(卷33)^[2:895]、“蒋琬守汉中,闻司马懿南向,不出兵承虚以犄角之,反委汉中,还近成都”。(卷47)^[2:1145]可见,吴蜀双方对于东西联合、共同对魏方针所产生作用的深刻认识。

3.2 “西土之援”的不足之处

(1) 受政治因素和交通、通讯方式滞后性等影响,“西土之援”所营造的“合东西之势”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经营“西土之援”,“合东西之势”,其精髓在于利用两个不同战略方向的配合进攻,迫使敌军疲于奔命自顾不暇,进而达到战略目的。但是,吴蜀两国彼此相去甚远,再加上通讯手段的落后,双方也没有专门建立特殊的军事联络方式,吴国若有行动,“蜀在万里,何知缓急而便出兵乎?”(卷47)^[2:1145]面对复杂多变的战争形势,处于两个方向的吴蜀,不能积极有效的展开快速反应,根据时机配合进攻,双方的联合行动仅限于“克期大举”,这就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合东西之势”的战略作用。(卷56)^[2:1307]

另一方面,无论是诸葛亮的“跨有荆益”还是鲁肃的“竟长江所极”所着眼的利用荆、益二州的钳形攻势都是基于一个政权内部的战略考虑。复杂多变的形势使得吴蜀分居荆益,东吴经营“西土之援”,吴蜀配合,合击中原成了两个政权之间的军事行动。双方对相关军事行动不可能有具体的战役规划和战役配合,联合进攻仅仅停留在双方在两个不同方向分别用兵的层次,一个方向的胜利不能使得另一个方向有着相应的连锁反应。而且双方的军事行动存在着很大的观望性,都有着坐看友军胜负徐图而进、坐收渔翁之利的想法,这就使得联合进攻的效果大打折扣。

(2) “西土之援”凭外交形式维持,易受益州形势变化的制约,影响波动大,即“籍外交而不能固”。

东吴谋求“西土之援”归根结底是在谋夺益州未果之后迫于三国大势而采取的无奈举措,然而益州的重要性使得“西土之援”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其一,经营“西土之援”只是减弱了遭受顺流而下攻击的威胁,却没有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因此,东吴一直重视经营与蜀汉交界地区的国防建设,被陆逊、陆抗父子称为“国之蕃表”“国之西门”的西陵、建平之地常年保持重兵驻防,(卷58)^[2:1359-1360]吴蜀关系一有不测之处,便会“东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

守”。(卷45)^[2:1076]同时,吴蜀双方有着孙权夺荆州、刘备败猇亭的激烈交锋,只要时机成熟,随时会重燃战火。其二,东吴并没有彻底放弃对益州地区的争夺,其始终立足形势,伺机略取益州。诸葛亮死时,蜀国政治动荡,“吴虑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万人,一欲以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卷45)^[2:1075-1076]后来在蜀国被灭之时,“吴闻蜀败,起兵西上,外托救援,内欲袭(罗)宪”,攻打蜀国的永安地区。(卷43)^[2:1008]除此之外,东吴还积极谋划蜀国南部的少数民族叛乱,企图借机夺取益州地区。(卷49)^[2:1192]虽然这些活动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东吴对益州地区的谋夺之心可见一斑。复杂多变的形势使得吴蜀关系常常处于紧张状态,仅凭一纸盟书、双方来使所维持的“西土之援”变得很不稳固。一有不测,“西土之援”随时可能演变为西土之敌。

总之,东吴在谋夺益州未果的形势下,积极应变,经营“西土之援”,“合东西之势进图北方”,这一举措虽然因为吴蜀联合又对抗的复杂关系存在着局限性,但从整个三国大势来看,经营“西土之援”保障了东吴立国江左的安全性,使其在南北对峙中得以立足,也为后世考虑荆州、益州、东吴三地兵要地

理上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参考文献:

- [1] (南宋)李焘. 六朝通鉴博议[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9.
- [2] (晋)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3] (清)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4] 宋杰. 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5] 张大可. 三国史研究[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3.
- [6] 施和金. 中国历史地理研究[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7] 赵国华. 三国时期的吴蜀关系[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1): 113-119.
- [8] 张大可. 略论三国形成时期的外交[J]. 史学月刊, 1987(9): 65-70.
- [9] 朱绍侯. 吴蜀荆州之争与三国鼎立的形成[J]. 史学月刊, 1991(1): 14-24.
- [10] 陈乾康. 论三国时代的吴蜀同盟[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4): 122-126.
- [11] 陈金凤. 孙吴益州战略论析[J]. 军事历史研究, 2005(4): 86-93.
- [12] 马强. 地理环境因素与汉末三国历史进程[J].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2): 53-57.

Try to Talk About the East Wu “Western Aid of Soil”

XU Chao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Rectified the complicated and changeable situation makes the EastWu slightly take the profit strategy fails to implement, in order to reduce threats, upstream against CaoWei Dynasty. The EastWu actively seek to signing of the “west soil”. Its operation “the signing of west soil” guarantee the safety in the west of the homeland defense, to a certain extent, caused the potential north into the figure of “or” good momentum. Because of the relationship varied, however, “the signing of west soil” is not solid, there is a “close of” role of limitation and “citizen diplomacy and cannot be fixed” problem.

Key words: The EastWu; State of Yi; Western aid of soil; military geography; Li Tao